

梁漱溟先生村治論文集

中國民族自救運動
之最後覺悟

北平村治月刊社發行

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村治論文集）

正集目次

一、主編本刊之自白·····	一
二、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	二七
三、我們政治上的第一個不通的路——歐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	一〇一
四、我們政治上的第二個不通的路——俄國共產黨發明的路·····	一四三
五、中國問題之解決·····	一七七
六、敢告今之言地方自治者·····	一九三
七、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設立旨趣及辦法概要·····	二〇七
八、丹麥教育與我們的教育·····	二二七
九、北游所見紀略·····	二五七
十、河南村治學院旨趣書·····	二八九

附集目次

勉仁齋讀書錄·····	二九九
悼王鴻一先生·····	三二五
敬以請教胡適之先生·····	三三三
「建設新社會才算革命」答晴中君·····	三四三
答馬儒行君來書·····	三五—
敬答嚴敬齋先生·····	三六三

主編本刊之自白

我今執筆將與讀者諸君在本刊相見了；那麼，我想先要有一段の自白。

這段自白可分四小節來說，其目如次：

一、我是怎樣一個人？

二、過去幾年の煩悶，產生今日的主張。

三、最近努力所在，和主編本刊の由來。

四、我對國民黨の態度。

一 我是怎樣一個人

我是怎樣一個人？知道者自是知道；不知道者慢慢地亦總會知道；這似乎原不必提出向大家告白的。其如社會上相識與不相識的朋友，都容易對我有一種誤解；尤其是愛我而關心我的行止的朋友，因不了解我，而替我可惜或擔心。那麼，就頗有向大家剖說兩句的必要了。

大家誤解我什麼？這就是誤認我是一個學者，甚或說是什麼『哲學家』『佛學家』『國學家』……這真實於兩面都不合適：一面固然糟踏了學者以及國學家；一面亦埋沒了我。單純粹的本來面目。我原是個不學的人，更且從來不存求爲學者之一念。十數年來，雖亦屢任大學講席，亦屢有著述出版，都是誤打誤撞出來的；自家亦莫明其妙。在民國十年第一次

出版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自序上，我曾申白：

在別人總以為我是好談學問，總以為我是在這裏著書立說，其實在我並不好談學問，並沒有在這裏著書立說；我只是說我想要說的話。我這個人本來很笨，很呆，對於事情總愛靠實，總好認真。就從這沾滯的皮氣，而有這本東西出來。我自從會用心思的年齡起，就愛尋求一條準道理，最怕聽『無可無不可』這句話。所以對於事事都自己有一點主見，而自己的生活行事都牢牢把定一條意義去走。因其如此，我雖不講學問，却是眼睛看到的，耳朵聽到的，都被我收來，加過一番心思，成了自己的思想。自己愈認真，從外面收來的東西就愈多；思想就一步一步的變。愈收愈多，愈來愈變；就成功。今天這樣子。我自始不知道什麼叫哲學，而要去講他；是待我這樣做過後，旁人告訴我說：『你講的這是哲學』，然後我才曉得。我思想的變遷，我很願意說出來，給大家聽。不過此次來不及，打算到明年三十歲，作一篇『三十自述』再去說。此刻先把變遷到現在的這一步，發表出來，就是這本書。我要作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的性情不許我沒有為我生活作主的思想。有了思想，就喜歡對人家講；尋得一個生活，就願意亦把他貢獻給旁人。這便是我不要談學問而結果談到學問；我不是著書立說，而是說我想要說的話的緣故。

又在民國十五年春上，着手寫定『人心與人生』一書時，先寫得一篇自序，亦復有類此的申白：

（前略）明白這一層，則知我雖然初不曾有意要講心理學，而到現在沒有法子避心理學而不談，雖然西文程度太差，科學知識太差，因而於現代學術幾無所知，原無在現代學術界來說話的能力；而心難自昧，理不容屈，偏處此際，固不甘從默謝短也。『人心與人生』之所為，凡以此而已！（註一）

談學問，在我祇是不得已，非有是心。以妄談學問之故而被人目為學者，在我祇是欲逃

（註一）——『人心與人生』一書尙未曾出版，僅於十六年春為北京學術講演會講過三個月，約得原書之半；此序則會

一度刊登晨報副刊。

不得；亦不過是人家呼我爲牛，則牛應之，呼我爲馬，則馬應之而已耳！區區之志固不在此。乃社會上愛我的朋友，見我近年行事似在做一種社會運動或政治活動，多有疑訝我拋開學者生涯而別取途徑，擔心我將捲入濁流者。亦有認此種運動必無結果，勸我不如研究學問者。更有幾位有心人，認我往者從人生思想上指導社會，是根本重要的事業；乃若現在所用心的鄉治或村治之事則儘可有旁的人能作，而無須乎我來作；都勸我不要輕棄自己的責任。表示這類意思的信件我接得很多，其中儘有全未謀面的。至於當面見教，問我爲什麼忽然改行的，更隨處都遇着。於此，我倒想起我的一位知己了；——那就是胡適之先生。民國六年我游湘目睹南北戰爭之禍，歸來便發表一篇『吾曹不出如蒼生何』的文章，印成小冊子到處分送散布，（註一）其時我在北大任課未久；適之先生亦是初從美國回到北大。我這篇文章很得他的同情與注意。其後，事隔數年，他還提起來說，當日見了那篇文以後，即在日記上記了一句話：梁先生這個人將來定會要革命的。善哉！善哉！適之先生其知我乎！做社會運動自是我的本色，大家實無所用其疑訝。

更往上追述去，則民國元年我且曾一度熱心社會主義，達於高潮。當時我亦作了一種『社會主義粹言』的小冊子。無錢付印；從朋友處借得謄寫板，自己寫，自己印。印了幾十份

（註一）——『吾曹不出如蒼生何』一文，曾編入漱冥卅前文錄。他很可以代表出我在時事感觸中的心理是如何；而二年前我的思想見解亦於此可徵。——那時節蓋猶在夢想歐洲近代政治制度在中國之實現也。今附本期之末，備參攷。

，分送朋友。(註二)我二十歲以後之歸心佛法，實由此熱潮激轉而折入出世一路者。

更往前追述去，則清末光緒年間，我十四五訖十八九歲，在中學堂讀書時，專愛留心時事，天天討論我們應該『革命或立憲』的問題。始而我是傾向立憲論的；後來亦跟着朋友跑革命了。辛亥年我們組織所謂京津同盟會，亦鬧了些手槍炸彈的把戲。民國以後，我在家奉親，閉戶讀佛書，似乎是不問時事了。然而心裏仍拋不下。我前於輯印先父遺書時，作有『思親記』一篇，其中有一段，很可見當時情形。

(前略)公尤好與兒輩共語，恣之言，一無禁。吾兄既早就外傳，及長又出國游；兩妹則女兒稚弱；健言者惟澈溟。公固關懷國家，溟亦好論時事；於是所語者什九在大局政治新舊風教之間。始在光宣間，父子並嗜讀新會梁氏書，溟日手新民叢報若國風報一本，肆為議論，願皆能得公旨。洎入民國，漸以生乖；公厭薄黨人，而溟故祖之；公痛嫉議員並疑其制度，而溟力護國會。語必致迕，諸類於是，不可枚舉。時局多事，倏忽日變，則亦日夕相爭，每致公不歡而罷。然意不解，則旋復理前語；理前語，則又相爭。當午或為之廢食；入夜或致晏寢。既寢矣，或又就榻前語不休。其間詞氣暴慢，至於喧聲達戶外者有之；悖逆無人子禮。嗚呼！痛已！兒子之罪不可贖矣！

此段原文，意在述我對已往悖逆的悔痛。然而父子兩人的一副呆氣亦活露出來。以閉戶家居的父子兩人，表面上似乎任你天翻地覆亦可不管的，乃偏偏對於國事或社會問題，辨之必明，爭之必力，如此關切認真！凡是能從性情脾氣上了解我的人，就可知道我今日之社會運動

(註一)——『社會主義粹言』稿已不存，憶似共分七章。民國十二年游曹州，為第六中學講演，曾述及其中『社會主義之必要』一章的大意。六中學生崔君萬秋為我筆記，標題曰『槐壇講演之一段』，初載於六中的刊物上，後載於北京大學日刊，今亦附本期之末，備參攷。

正是『題中應有之義』；而一向不過濫側學者之林，原非『爲學問而學問』者。

我實在沒有旁的，我祇是好發生問題；——尤其易從實際人事上感觸發生問題。有問題，就要用心思；用心思，就有自己的主見；有主見，就從而有行動發出來。外人看我像是在談學問，其實我不過好用心思來解決我的問題而已；志不在學問也。我一向之談哲學，談心理學，始終是此態度；今日所談又涉及政治與經濟，仍不外此。用心思或云談學問，只居其中間的一段落，歸結還在行動；來自實際固不歸於實際不止也。追根尋源，全在有問題，全在問題之實際性。

二 過去幾年的煩悶產生今日的主張

問題之來，要我如何能不問呢？眼前沒有路走，逼到你討一箇解決，你能裝聾作啞麼？十年前（民國七八年間）我的心思不能不縈迴在東西文化問題上，而沉思不解，必得解決而後已，祇是如此。今日不能不沉思在這中國民族前途問題上，猶是如此。東西文化問題是怎樣逼着中國人討箇解決，還待我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緒論中指點講明；至於這民族前途問題之在今日，似乎無待我再講明了罷。因爲那文化問題，要抽象些，或難理會得；而此則眼前實際的水深火熱之苦，數十年轉陷益深，茫無涯岸，不早令人心焦了麼！

『中國還會好，不會好？』『中國怎樣才能好？』差不多人人都會這樣發問了。然而世上亦正不少作夢發呆的人，在不可望的地方抱希望，彷彿沒有什麼問題似的。卽我自謂愛發現問題的人，其始亦何嘗不作夢發呆。蓋問題所在的認取，固未易言；而不知問題所在者往往容

易謂無問題也。我在民國十年講演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時，即尙不曾發現今日的問題。那時模糊肯定中國民族儘有他的前途，在政治和社會的改造上，物質的增進上，大致要如西洋近代或其未來模樣；便是原書所謂『對西洋文化全盤承受』的一句話了。於如何能走上西洋近代政治制度的路則亦未之深思；產業如何得發達，分配問題如何解決，總覺此誠費研究，而政治果有路走，這些總不會沒有辦法。『假以時日，自然都有解決的一天』；由今思之，這不是作夢發呆是什麼？十一年以後，方漸漸對於一向順受無阻的西洋政治治理路懷疑起來，覺得『這樣辦法恐怕不行』。固然，西洋近代政治制度在西洋人或中國人儘不少提出批評修正的，尤以歐戰後爲著；却並不與我心中疑點相應。我所疑在其根本；我不是在大體承認之下，指摘其弊病缺短，欲爲之補充修改。我已不認中國人不能運用西洋政治制度是一時的現象。我疑心中國人之與近代政治制度怕是兩箇永遠不會相聯屬的東西！

誰若沒有夢想過西洋政治制度在中國的做行實現，則他不注意這做行的困難，實現的無望，自無足怪。然而我是做過這迷夢來的；十數年間，眼看着事實上是怎樣的格格不入，愈去愈遠；如何能輕易放過而不深求其所以然？於是，我就於旁人不留意的地方，發見了中國民族精神和西洋政治制度間的大刺謬點。（註一）固然，西洋近代政治制度在中國不能仿行成功，亦是因許多客觀條件的缺乏或不合。然而那都不是根本的窒礙，無可設法的困難。唯獨這中國古代文化之邁越西洋近代文化之處，涵育得中國民族一種較高精神，則是沒辦法的所

（註一）此層將在『我們政治上的第一個不通的路——歐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一文中言之；本刊下期即可發表。

在；——中國人將不能不別求其政治的途徑。然則中國人將走一種什麼途徑呢？別求途徑，能不能求得呢？或問說：中國人其將怎樣建設他的國家？其將怎樣度他民族團體的生活？我又想不出。從此以後，便陷入懷疑煩悶之中！

我真是百般想，亦想不出一條道。假使中國到現在依然閉關自守，初未曾感受西來的勢力影響，那大概數千年的舊轍是不會改換的；根本不發生今日的問題。其如人類的歷史演化到這一步，使中國人一些逃免隱蔽不得。於是，這非開闢新途轍不可的形勢，就逼來了。雖然即在感受西來影響已八十年的今天，皇帝的再出現，從種種情勢上看，猶是頗有可能的；然而畢竟不行了。一切舊日迷信傳說觀念習慣等，在稍有知識的人已失墜毀喪無遺；同時其否認的心理却已很強地顯露在意識上。——這就築起了一大牆壁，使我們無法返回舊轍。『時代潮流所不許』，大家差不多皆會說這句話。語其內容，就是現時社會上自有其强有力的傾向，而這種傾向（帝制再興）則殊微弱，又且背逆着那有力的傾向。社會雖是多數人構成的，而說到這『有力的傾向』則恒視乎其間少數有力分子。——此於中國這樣的社會為尤然。孰為有力分子？就是較有頭腦較有知識的人，和較有勇氣較愛活動的人。雖然佔百分之八十多的蚩蚩農工，大都厭嫉民國而想望真龍天子，卻不能在社會上形成一箇較強的傾向。反而由少數最先感受西來影響的有力分子，對皇帝制度的否認，斷絕了帝制再興的命運。十幾年的擾亂不定，就是指示舊轍的已經脫失，新軌的未立。

新軌之不得安立，實與舊轍之不能返歸，同其困難；而世人不知也。舊轍之所以不能返

歸，其難在少數有力分子意識上明白的積極的否認他；新軌之所以不得安立，其難乃由吾民族（兼括有力無力分子）不明露在意識上的消極的不予承認接受。多數無力分子，從其數千年迷信和習慣，對於新制度無了解不接受，這是容易知道的；而其不接受實更有在迷信與習慣之外者，則人多不留意。少數有力分子固明明爲新制度之要求者，而在其意識後背隱暗處同時復爲其拒却者，人尤不留意。故十數年政局之紛擾，政象之濁糟，未嘗不指示我們新軌轍之消極的不被接受；而味味焉期望『民主』期望『法治』者，至今猶盈天下也。然而吾知其事之不可能矣！

中國人現下就夾在這有意識地否認舊轍，無意識地不接受新軌的當間。而更有難者。有意識的一面代表西來的時代精神；無意識一面代表民族固有精神；二者有無可以融通之道，固已不可知；猶且是我們似乎照顧了精神，還應須照顧到事實，——如何應付現在腳下所踐處的環境世界。世界是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競爭侵略的世界；我們本身是一箇爲其侵略下的生產技術簡拙，文化老衰的民族。不但要照顧到現在事實，似乎還應須照顧到未來變化；因爲現在的這世界局面又是不能長久的，其將轉變出一新局似有不容已之勢。於是我們更須於此時準備着變化，含容了未來，庶乎其可。那麼，這個問題就真難了！本來人類歷史走到了如今日的世界可算奇詭艱難，猛烈複雜前所未有。可說整箇的世界都在問題中。而中國人此日所遭際的難題，不但是有史以來未曾遭過，而且並世中別的民族亦不曾有可比例的呢！天似乎。在試驗中國人能不能解答這個難題；中國人似乎很少有人能。看到這箇難題；我則看到，

而愁悶不知所出。

在我發悶的期間，南方一種新興的民族自救運動開始了——這就是十三年的國民黨容共改組。我於這新運動的開始，雖經當時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領袖李守常先生從廣東回來對我談他們與國民黨合作的意義頗詳。（據他所談，法國式的革命在中國尚未完成；因而俄國式的革命尚不到時機。他們已放棄了暴力革命勞農專政的主張，而從事於國民革命，爭求國民的政治自由，如集會結社罷工等自由，以爲發達工人組織的地步。並說他們勸孫先生不要一味在軍事上用力，親自打東江，而應當到內地各省作一種國民運動。這所說似乎與他們後來的行動方向不符。然在當時確乎是真的。一九二三年『前鋒』是他們機關刊物，其中陳獨秀的『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一文發表的意思即如此）。然不久，我到山東曹州辦學去了，守常亦出國赴歐，消息遂隔。迨十四年廣東局面漸次統一，而黨的特殊精神亦分外著露；許多朋友身預其間的，都盼望我南去。我於此時才知注意，而似不無懷疑——或者只是無解於我的煩悶。他們招喚之不已，至於督責備致；——陳真如先生，張難先先生來信猶多。他們說我不應該關起房門，高談哲學。蓋其時方以曹州辦學失敗回北京，謝絕各方邀聘，與一班青年朋友閉戶共讀。然在我怎能去呢？自己胸中猶疑煩悶無主張，要我跟他們一齊幹，還不甘心；要我勸他們莫幹，更無此決斷與勇氣；則去又何用？却是在大局沉悶陰霾之中，忽睹此一點陽光朝氣，自足使我們同情和注意。求着了解他的心是很切的。於是就從我們朋友中分出三個人——王平叔，黃良庸，徐名鴻，——去廣東見識見識，歷練歷練；我自己則未

去。

到十五年北伐，這種新興運動到達長江；全國震動，青年界猶爲興奮。我亦於九月南下，想到武漢會見我那朋友；——原在廣東的朋友陳真如先生（銘樞）率師爲到武漢的先鋒隊；而且新去廣東那兩個朋友亦隨師北伐一路到了武漢。但結果則我未曾到武漢，只到了上海南京。——這就可以看出我自己之一面心焦，一面又沒定見，沒主張了。在上海却無意中看到國家主義派領袖曾慕韓先生。那天恰好是雙十節，他們用淺紅紙印刷的『醒獅』上面，發表有他們的『建國大綱』（原文標題記不清，其意若此。）若干條。曾先生對我談話甚多，一面批評國民黨，一面說明他們的主張。但他雖說得天花亂墜，一樣的無解於我的煩悶。換言之，我心目中的問題他們都沒有。

我旋即回到北京；而以時局之變——武漢反蔣，陳先生原是衛戍武漢的，現在站不了，

——我那兩朋友王平叔黃良庸，於十五年底十六年初，先後秘密離漢北來；於是我們復聚於北京。自他們十四年南去之後，常常要以到處所觀察的報告於我。他們先在廣州晤會我們的朋友李任潮（濟深），伍庸伯（觀淇），陳真如，張難先諸先生；旋即隨同陳真如白健生兩位入湘（接洽唐生智）；又回轉廣州；又隨師北伐，沿醴陵平江而到汀泗橋賀勝橋打吳佩孚，下武漢而衛戍武漢。每到一處，必有很多信來。這一次新鮮而劇烈的經驗，當然給了他們很大變化。王平叔最先欣賞了共產黨理論；徐名鴻遽爾入了共產黨；祇有黃良庸不移不搖。他們彼此意見竟不能歸一。這一則見出我們朋友的不切實不濟事；一則見出我們的空洞沒有成見。

回京而後，師友重聚，更相切磋，乃各大大有所進；亦是離去空氣緊張人心已呈異態的武漢，而回到寧靜寬舒的北京家裏——那時我們十多人住在北京西郊大有莊，所謂家裏便是我們的朋友團體——頓然恢復得和平正常心理，正有不待切磋而各自覺悔者。而數年往來於胸中的民族前途問題，就此新經驗後，從容省思，遂使積悶夙痾，不期而一日開悟消釋。

悟得了什麼？並不會悟得什麼多少新鮮的。只是掃除了懷疑的雲翳，透出了坦達的自信；於一向之所懷疑而未能遽然否認者，現在斷然地否認他了；於一向之有所見而未敢遽然自信者，現在斷然地相信他了！否認了什麼？否認了一切的西洋把戲，更不沾戀！相信了什麼？相信了我們自有立國之道，更不虛怯！天下事，有時非敢於有所捨，必不能有所取；有時非有所取，亦每不敢有所捨。不能斷然有所取捨，便是最大苦悶。於所捨者斷然看破了；於所取者斷然不予放過了；便有天清地寧，萬事得理之觀。——我們之所謂一日開悟亦不過是如此罷了。

我們以前，何嘗不自以為認識了西洋人，和西洋文化的一切；然於近代政治制度的西洋把戲畢竟不曾識得。後來覺察得彼此間的刺謬不合，則既否認之矣；似乎又何待今日而後乃否認西洋把戲？然實待共產黨方啟發了我們，對西洋人及其一切把戲的認識到最後一通透點；而後恍然，而後太息，西洋把戲之真不得而用之也！原來天下事理，先時都見得些，所差只爭個透不透；誰人都會得些，所爭只在咬得定咬不定。

你看：共產黨的理論，多麼值得玩味！有聰明有頭腦的人如何不傾向他？共產黨的要求

多麼值得同情！青年人，有心肝的人如何不傾向他？他們活動起來，有的處奮迅發揚，有的處緊密結實；這又使青年人，有勇膽能幹的人，多麼逗勁而爽心快意的去幹！當十二三年全國陰晦沉悶，最燥人不過的時候，如何不成了最應時的玩藝？革命總不成功，正沒辦法的國民黨，如何能不跟着他走？（代表十三年改組後之國民黨的，是國民黨左派；國民黨左派則是變相的共產黨）十三年以來的革命潮流，便是這樣由社會上有力分子所形成的有力傾向。然而自我們一度經歷嘗試過後，我們知其無能爲矣！他與我們民族精神是大相刺謬的；有意識的傾向他之人，在其意識背後仍舊無意的拒却他；而以我們的精神實超邁於他之故，他將無成功之望。這有一個我們所信的大原則在，就是：凡高過我們固有精神的，便能替我們民族開新生機；若低下一些，便只益死機；在我們固不能由是開出新生命，即在他亦不能成功。我們所以敢於否認西洋政治制度者在此，所以敢於否認共產黨的亦在此。我對於西洋近代政治制度，於迷信過多少年後，起了深重的懷疑；正在懷疑的當兒，來了共產黨；自然不易再迷進去，而且存有多少懷疑的陰影。然而當那時期，誰能對這新興的一股潮氣不抱很大的期望之意和同情之心呢？這這一層又透過來；則不獨認識了共產黨，實更深刻地認識了西洋人。——所認識的初無異於前，祇是重新地更深刻地認出了而已。夫然後我才斷然澈底地否認了一切西洋把戲，更不沾戀！

我們至此方才恍然，我們幾十年愈弄愈不對的民族自救運動，都是爲西洋把戲所騙（自是出於自家的迷惑顛倒，怪不得人）；殊不知西洋戲法，中國人是要不上來的。而同時在認

識了西洋人的地方，亦就認識了自己，因而於所以自立之道亦就看出得差不多。所以自立之道，以前何曾不識得，只是信不及；現在所見益確，信之乃篤。更且是對於旁的方法道路斷念了，則無復可以依違瞻顧者，而道路亦就有了。

本來在我們過去幾年的懷疑煩悶中，亦不是沒有一點正面的積極的自己所見；譬如民國十二年春間我在山東曹州中學的講演，就已提出『農村立國』的話。這意思在我心裏萌芽得頗早，然而這話則要算章行嚴先生先說的。章先生因此而出任北京農大校長。唯至今不得聞其詳（僅記得他在上海報上發表過文章，說中國是農業國，沒有工商業，所以不能行代議制度而已）。當時王鴻一先生即大為注意，要去訪問他，囑我作函介紹，乃亦不曾會談到。然我實沒有鴻一先生那樣積極熱心。不但陳獨秀先生警告我們說，這是小資產階級欲在自己腦中改造社會的幻想，即我自己亦生怕是主觀上的烏託邦，無用的長物，而不敢自信。所以十三年間，鴻一先生連合米廸剛先生創辦『中華報』，請尹仲材先生為主筆，組織一研究部，要從這個意思討論得一具體建國方案，我全不曾參加。（註一）不過有時鴻一先生拿他主張的，徵問於我；我必盡情貢獻我粗糙的感想意見而已。後來他們以討論所得結果，出一本『建國芻言』；內容先談原理，後提出『中華民國治平大綱草案』。（註二）其中很有些偉異的識見與主

（註一）彷彿十七年尹先生的村制學講義序文內，提到當日之事，亦將我名列入；實則中華報研究部的討論會我沒出席過一次。

（註二）治平大綱共十七條，每條於條文之前有一小題目；其目如次：民主傳賢國體，農村立國制，村治綱目，縣治與省治之實與事項，選賢與傳賢，考績制，中央行政，省行政，縣行政，均田制度，因利的金融制度，公營的營業制度，工商制度，禮俗，軍制，度支，附則。內容鹵莽滅裂，在所不免，然亦自有難能可貴之處。

張，——大綱上第一條規定了傳賢民主國體，第二條規定了農村立國制，——我頗點頭承認；然我總不敢信，就是這樣便行。我總覺還有疑問，和應該顧慮到的許多問題，而放心不下。建國芻言出書時，鴻一先生要我作篇序文，我都做不出。十五年鴻一先生避居在東交民巷使館界內，我們還時常見面談這問題；他極力督促我作文章介紹他們的主張於社會。我會發憤決要將我所贊成的意思表示一點，但依然做不出。可憐我原是在懷疑煩悶的時期中啊！不拿起筆來還好；拿起筆來運思，便疑從心上起，悶自膽邊生，寫不得幾個字又擱下！（註一）然則究竟有些什麼疑問？這些問題後來又怎樣便得解決？問題自多的；如何解決下來，更就一言難盡了。這須待在本刊上慢慢一點一點向讀者請教。現在姑舉出其最大三問題：

一、鴻一先生的所謂『學治主義』，『傳賢政體』，我相信得及那是中國民族將來政治上必出的途徑；——或者就是世界上共由的途徑亦說不定；然而非所論於今日。今日無論是從本身國內情勢上看，或外面國際形勢上看，全都不能行的。

二、我曾說過，我們的難題，是一面須照顧得民族過去歷史固有精神，一面還須應付眼前脚下所踐處的環境世界，更一面要準備着世界的變遷，未來的文化。所謂『學治主義』，所謂『農村立國』，或於固有精神，未來文化，不無相應；然而獨何以處茲環境

（註一）鴻一先生實在是我們的急先鋒。他能標揭主義；他能建立名詞；他能草訂制度。他每每說願服從我的領導指揮；却是他總站在我前頭！雖至今猶然。所以鴻一先生的言論，我是至今不敢替他全負責的。